

簡析身心障礙者近用司法之保護

李秉宏

壹、前言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2014）（*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以下簡稱CRPD）規定：

1.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
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
包括透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
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
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
中，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
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
2. 為了協助確保身心障礙者有效獲得
司法保護，締約國應促進對司法領
域工作人員，包括警察與監所人員
進行適當之培訓。（第13條）

此即所謂CRPD身心障礙者（以下簡
稱障礙者）近用司法保護條款，為具體揭
示該條之內容，CRPD委員會除曾頒布若
干一般性意見，部分闡明該條之適用，已

於2018年決議通過《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
際原則與指引》（以下簡稱《近用司法指
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
2020）。為使讀者能對障礙者近用司法之
保護有初步之認識，本文擬從「近用司法
有關障礙者之範圍」、「障礙者近用司法
程序之範圍」、「障礙者在救濟程序上會
扮演之角色」、「障礙者於司法程序上所
面臨之障礙」及「未來之建議」等五方
面，提出我國如何促進障礙者近用司法
保護之方向，供關心此一議題之讀者予以
參酌。

貳、近用司法有關障礙者之範圍

CRPD（2014）明文揭示：

身心障礙是一個演變中之概念，身心
障礙是功能損傷者與阻礙他們在與其他
人平等基礎上充分及切實地參與社會之各種
態度及環境障礙相互作用所產生之結果。

（前言e款）

亦明文規定：

身心障礙者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其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身心障礙者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充分有效參與社會。（第一條第二項）

由上可知，凡屬人因身心靈之功能產生減損或喪失，而與大環境間產生障礙者，即為CRPD中所指障礙者。

由於障礙者進入司法程序中，不問是否依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只要具備前揭CRPD所指障礙者之特徵，皆可能於司法程序中面對各類障礙，加之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1980／2021）（以下簡稱《身權法》）所指「身心障礙者」，其取得身心障礙證明之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國家提供障礙者社會福利能否於有限資源範圍內做合理分配之設，顯與障礙者進入司法程序所需面對之問題並不相同，故障礙者本身縱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凡具有前揭CRPD所指身心障礙特徵者（如：精神障礙、失智老人、特殊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受法院監護或輔助宣告確定之人、領有重大傷病卡之人等），解釋上皆應認定為CRPD第13條近用司法之對象。

為解決此一問題，未來如欲尋修正《身權法》或另訂特別法之方式處理此一問題，建議應明定近用司法保障之障礙者，如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皆可獲得司

法保障：

- 一、依《身權法》（1980／2021）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 二、依《特殊教育法》（1984／2023）鑑定或評估為身心障礙學生。
- 三、依《精神衛生法》（1990／2022）認定具精神疾病之人。
- 四、依《老人福利法》（1980／2020）認定為失能老人。
- 五、經法院裁定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 六、其他情形，依《全民健康保險法》（1994／2023）領有重大傷病卡之人，且具身心障礙之特徵。

參、障礙者近用司法程序之範圍

CRPD（2014）第13條第一項前段明文規定：「締約國應確保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惟此處所指「司法」其範圍就應如何界定，對此，《近用司法指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2020）於序言中明文揭示：

每個人都應在與他人平等之基礎上，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之權利、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之保護、享有公平解決爭端、有意義之充分參與並獲得傾聽之權利。國家必須通過提供必要之實質性、程序性、適合年齡和性別之調整措施和支助方案，以確保所有障礙者能夠享有平等近用司法之權利。本文所述之個人權利和國家義務

適用於所有法律程序（民事、刑事和行政），無論爭議解決程序或場所、以及包含調查、逮捕、其他初步階段以及裁決後階段（包括提供補救措施）之所有階段。

由上描述可知，此處所指「司法程序」，並不限於法院指掌之司法程序（如非訟程序等），尚包括其他政府機關（構）或法律明定單位所受理之各類救濟程序，具體而言，依據國內各項救濟程序觀之，解釋上包括：訴訟、非訟、偵查、訴外解決途徑、仲裁、行政事件之申請或救濟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

所稱訴訟，指民事訴訟、家事訴訟、刑事訴訟、少年事件之調查及審理、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審理程序、憲法訴訟及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

所稱非訟，指《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非訟事件法》、《家事事件法》、《破產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提存法》、《公證法》、《強制執行法》或其他法律所定法院或民間公證事務所職掌之非訴訟程序。

所稱訴外解決途徑，指依法於法院、各級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團體進行和解、調解、調處、協商、協調或其他法律所定之處理程序。

所稱行政事件之申請或救濟程序，指依法申請做成行政處分；或依法提起申訴、再申訴、申覆、覆審、爭議處理、裁決、複查、異議、訴願或其他行政救濟程序。

肆、障礙者在救濟程序上會扮演之角色

觀察臺灣及世界各國司法制度之實務運作，障礙者於法庭或其他救濟程序上，除了會成為繫屬案件之原告、被告或參加人，障礙者也有可能成為程序進行中之審理者（如：法官、陪審員、調解人、仲裁人、訴願委員會委員等），擔任當事人委任之辯護律師，而在某些時候，障礙者因案件之需要，也可能會經法院傳喚擔任證人、鑑定人。可知，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是否考量障礙者之個別需要，不單影響當事人救濟上之權益，也會影響具身心障礙身分之司法人員以及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中之利害關係人，能否順利運作司法制度之關鍵。因此，《近用司法指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2020）於序言中乃明文揭示：

《原則與指引》可以酌情適用於所有法律程序中之所有直接和間接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者、被告、索賠方、受害方、陪審員、司法人員、執法人員和證人。

而根據現行國內法之運作情形，障礙者於司法程序中可能會扮演以下之角色。

一、程序當事人

此處所指程序當事人，乃指障礙者為原告、被告、告訴人、自訴人、參加人等。

二、程序審理人

此處所指程序審理人，乃指障礙者於司法程序過程中擔任法官、國民法官、陪審員、參審人、技術審查官、司法事務官、仲裁人、調解人、訴願委員、書記官、其他程序審理人等。

三、程序協助人

指障礙者於司法程序中擔任訴訟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程序監理人或其他受委任協助程序事務之人等。

四、程序參與人

指障礙者基於案件需要，出庭擔任證人、鑑定人等。

五、程序中介人

障礙者於司法程序中亦可能扮演中介人之角色，所謂中介者（亦稱「協助人」）之意，參酌《近用司法指引》原則之定義，係指根據司法系統和障礙者之需求，在法律程序中為他們提供有效溝通之人員（如：通譯、手語翻譯、聽打員、視力協助員、口述影像翻譯人、專業陪伴人、個人助理等）。中介者能支助障礙者在充分理解後做出知情抉擇、確保事物以障礙者能夠理解之方式被解釋和討論，並確保障礙者可近用適當之調整與支持。中介者是中立之人，他們不代表障礙者或司

法系統，也不引導或影響決策或結果。

六、程序旁聽者

依據現行司法審理原則，除特殊案件必須保密者外（如：家事事件、性侵害案件、侵害營業秘密事件等），皆採取公開審理之原則，亦即民眾皆可前往法院旁聽，在此情況下，障礙者亦可能前往法院或其他審理單位旁聽整個開庭狀況，故對於旁聽之障礙者，亦須顧及其旁聽時之基本需求。

伍、障礙者於司法程序上所面臨之障礙

一、欠缺法律知識之障礙

首先，不問視障礙者亦係非障礙者，多數人並未受過法律專業訓練，加之障礙者除因特殊情事需面對自身之案件外，平時生活中甚少會進入法院、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受理權力救濟程序之團體，因此障礙者除對於司法程序較為陌生外，於進入司法程序之過程中，須面對缺乏法律專業知識之處境，倘其進入司法程序中未有熟悉法律專業之律師從旁協助，容易產生無法替自身爭取法律上權益之情形。

二、經濟上之障礙

其次，障礙者如欲主動或被迫須進入司法或其他救濟程序，依法至少須向法

院或特定受理單位繳納訴訟費或其他救濟程序之費用（如：依據訴訟標的之金額100%預納之裁判費、訴訟進行中進行鑑定之鑑定費等），倘障礙者本人欲獲得完整之法律保障，可能須委任律師強化其法律上之攻防，且為避免他造脫產而影響其最終權力之實踐，實務上多會循假扣押等程序以凍結他造名下之財產，惟委任律師辦理案件本質上是一項昂貴之服務，每一審級至少須給付數萬元之律師費，若有進行假扣押之必要，尚須繳納訴訟標的10%或1/3不等之擔保金給法院，由於臺灣社會中，相當數量之障礙者乃因生理因素難於參與社會生活，屬社會上之弱勢族群，且觀之該族群亦多為經濟上之弱勢者，有鑒於障礙者如欲以上開方式尋求救濟，常需花費相當之費用，恐將造成行使權利之障礙。

三、欠缺法律上相應請求權基礎或主觀公權力之障礙

又查，障礙者於司法實務上，除了會面對非障礙者所面對之法律問題，有時亦會面對專屬於障礙者常見之法律問題（如：障礙者遭逢歧視、欠缺無障礙空間與資訊、重度障礙者使用個人助理時數上限之爭議等）。由於臺灣係以大陸法系為骨幹之國家，倘障礙者遭受歧視、欠缺無障礙空間或資訊、個人助理時數上限等爭議，實際上致其權利遭受侵害者，於民

事或公法尚須有相應之請求權基礎或主觀公權力作為尋求救濟之依據，惟察現行法律，此部分欠缺相應之請求權基礎或主觀公權力之依據，導致實際上障礙者遭逢上開法律問題，即使進入司法程序，亦可能因無前揭法律上之配套措施而遭敗訴判決。

四、空間上之障礙

此外，障礙者中肢體障礙者（下稱肢障者）如發生爭訟事件而需進入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則法院、檢察署或其他救濟程序受理單位有無建制完整之無障礙空間，對肢障者能否使用法庭資源實屬必要之需求。蓋乘坐輪椅或使用拐杖之肢障者如要使用司法資源，會面對「法院外之空間有無平坦或可資行動之無障礙坡道」、「法院之大門是否方便進出」、「法院內之走道是否無障礙」、「法院內是否設有寬度足資移動之升降梯」、「法庭內之擺設與布置是否使肢障者容易進出及順利移動」、「法庭內之桌椅是否合乎肢障者使用上之需要」及「法院內是否設有肢障者可資使用之無障礙廁所」。

前揭空間及設備設施上之設計，因攸關肢障者之進出、移動、生理需求及法庭內之基本尊嚴，若法院、檢察署、法院及其他救濟程序受理單位未建制肢障者可資使用之無障礙空間及相關設備設施，牽涉肢障者之聽審權、行動自由及人性尊嚴，

對於肢障者於程序中之表現勢必造成重大影響。對此，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受理單位應盡力改善前揭無障礙空間及其他設施設備，以保障肢障者參與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之權益，若短期內無法一步到位者，則應依其個別需要就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採取適宜對待措施（如：提供遠距視訊設備等）使肢障者能以其他替代方案順利參與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

五、資訊上之障礙

另外，臺灣司法實務之運作，法官、檢察官及律師於整個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之參與過程，皆會經歷會客、撰狀、閱卷、蒐證及開庭等階段，而在此期間，除了透過傳喚他人出庭作證為其證據方法，多數之案情皆藏於法院之卷證資料中，故檢察官或律師皆會透過閱卷、勘驗證物等途徑蒐集事證，以便辦案過程中之會客與撰狀。然而多數之證物皆係以書面、照片、影片或其他視覺感知之物予以呈現，故開庭當下，法院皆會以現場播放、提示證物之方式進行調查，法官、檢察官、律師、當事人須透過視覺之接觸方能知悉前揭書面或影像之訊息。

此外，多數審判筆錄之製作，皆係由書記官將開庭現場審、原、被三方及其他程序參與人之陳述記錄於電腦中，再透過現場電腦螢幕之呈現由各方以目視之途徑確認筆錄內容。由上可知，臺灣之法庭活

動，絕大多數之訊息皆需透過視覺感知之方式使得獲悉。然而若司法人員、當事人或其他程序參與人為視覺功能障礙者（下稱視障者）、閱讀障礙或其他視覺感官有障礙之人，如無受過口述影像訓練之人從旁協助進行報讀，或未有語音設備使前揭障礙之人透過聽覺獲悉文件內之訊息，亦會影響其聽審權及法庭上之攻防。

而在實務運作上，就有當事人是視障者，而在法庭審理之過程中，由於該案之證物多數為照片、影片及書面文件，對於視障之本案當事人而言，無法於現場目視法院所提示之各項證物，也無法知悉書記官所記之筆錄是否正確，只能藉由審、檢、辯間之陳述內容做為獲取資訊之來源。然而法庭上之攻防相當耗費心力，法官或辯護人實際上無法全然顧及視障當事人之需要，若司法人員（如：法官、律師等）為視障者，要掌握法庭活動之現場情事，亦須有他人之協助方可知悉現場之狀況。而透過該案之過程，顯見視障者於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之過程中，若無受過口述影像或視力協助訓練之人於法庭上進行協助，將造成視障當事人難以於法庭上保障其聽審權及其事實上與法律上之攻防，對此，自當檢討現行訴訟制度應強制給予視障參與者可攜同熟識口述影像或視力協助有經驗之人到庭協助，或提供電腦語音報讀軟體設備，以確保視障者之前揭權益。

六、溝通上之障礙

又查，法庭之運作，牽涉法官與當事人、當事人與委託律師、原告與被告及三方與出庭之證人或鑑定人間之對話、溝通、激辯與攻防，因此「言語之溝通」對於審、原、被三方及其他程序參與人而言，乃係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進行過程中不可或缺之因素。然而此種情形，對於不諳中文之人、聽覺感知有障礙之人（如：重度聽障者、年長重聽之人等）或欠缺陳述能力之心智障礙者，因無法知悉他人之言語內容，或無法明瞭他方之陳述，將影響其聽審權及訴訟上之攻防。

日前曾發生聽障人士因涉嫌肇事逃逸而遭檢察官起訴乙案，經判處有罪定讞，而經查本案當事人於審判過程中雖經法院同意由其親人擔任輔佐人，然而全案之偵審程序皆未請手語老師出庭擔任通譯，亦未委任律師替其辯護，可謂影響其偵審過程中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防禦權。而透過該案之始末，顯見聽障者於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之過程中，若無熟識手語之人於法庭上進行協助，將造成聽障當事人難以於法庭上保障其聽審權及其事實上與法律上之攻防，對此，自當檢討現行訴訟制度應強制給予聽障當事人手語翻譯、同步聽打服務或其他程序保障事項。

七、司法人員欠缺障礙意識之障礙

最後，臺灣之司法教育著重法學邏輯與法學論理之訓練，但多數之法官、檢察官、律師及法律學系畢業者於其成長過程中未必有與障礙者長期接觸之經歷，在此前提下，很容易按個人有限之經歷及內心之想像障礙者之生活模式及行為舉止，從而做出個人主觀之判斷。然而實際運作上，若僅憑個人之經歷作為判斷基準，很容易對障礙者實際之狀況產生偏頗之臆斷，如同欠缺性別意識之法律人於辦理或偵審性侵害或性別議題之案件時，若缺乏性別敏感度，容易造成當事人受到欠缺性別意識所造成之二次傷害。因此，為確保障礙者進入司法及其他救濟程序能獲得公平合理之判決，司法人員有無障礙意識將會是決定性之關鍵，倘審理人員欠缺障礙意識，等於間接剝奪障礙者公平聽審請求之程序性保障。

陸、未來之建議

一、應增定明定可資主張權利之請求權基礎及主觀公權力

臺灣為大陸法系之國家已如前述，倘障礙者因涉及歧視爭議、欠缺無障礙環境或資訊、爭取個人助理時數等權益事項，於民事或公法尚須有相應之請求權基礎為其依據，為解決此一問題，應於《身權

法》或另定之特別法明定專章，就障礙者權益受損之請求權基礎進行規範，其內容包括：防止妨礙、排除侵害、損害賠償、強制締約等請求權基礎，而就前揭請求權基礎之聲明事項，須有相應之損害賠償計算方式、請求無障礙環境及設備之建制、請求提供適切之合理調整、請求名譽受損之行為得要求公開道歉等聲明事項。

尤其，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除現行填補損害之方式，尚須有「特殊之損害賠償計算方式」（如：遭受歧視時所耗費之勞力、時間與費用；以及因遭受歧視所喪失特定機會可獲得之利益），倘行為人出於故意歧視者，可參酌國內有關懲罰性賠償之制度，於三倍或五倍之範圍內請求賠償。又實務運作上可能面臨損害難以舉證者，需有相應之法定賠償機制，亦即法院或仲裁庭可於多少額度之範圍內決定判賠金額，為其補充性之規定。

末對於舉證責任之配套措施，應有所調整，亦即障礙者對於歧視與權益受損間有盡到相當之舉證責任，則行為人需就無因果關係之項目負相當程度之反證，以平衡雙方間之舉證責任之分配。

二、應於《身權法》或另訂特別法中明定程序調整之相關規定

（一）現行法之規定

有關現行障礙者司法程序無障礙之保障部分，係明定於《身權法》（1980／

2021）：

法院或檢察機關於訴訟程序實施過程，身心障礙者涉訟或須作證時，應就其障礙類別之特別需要，提供必要之協助。（第84條第一項）

惟查現行規定，僅就障礙者於法院或檢察官前扮演當事人或證人時始適用本條之規定，對於障礙者於前揭單位扮演其他程序中之角色，或對於障礙者前往其他救濟程序之受理單位皆未有規範，實為現行法尚不足之處。

（二）應就各類障礙者明文規定其程序調整之具體內容

1. 對於心智障礙者

依據《近用司法指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2020）規定：

國家應保證障礙者在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並在必要時應提供行使法律能力和保障近用司法的必要支持和調整。

（原則一1.1）

其中該原則乃明文：

依據需求，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為障礙者提供中介者或協助人，以使障礙者與法院、法庭和執法機構之間進行清晰的溝通，並確保障礙者能夠安全、公平、充分和有效地參與法律程序。（原則1.2〔J〕）

考量審理人、當事人、參加人、告訴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如屬因神經系

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不僅限於刑事訴訟程序，凡審理該案件之審理單位，應強化其事實上之陳述能力，且若干此類障礙者於出席救濟程序，急需其值得信任之人陪同在場方能穩定情緒並做較完整之陳述，另考量若干輕度精神障礙者亦可能在特定救濟程序當中擔任審理人（如：國民法官、調解人）或擔任協助人（如：律師、社工等），於救濟程序進行中亦可能有此項需求。

基此，試擬條文明定審理人、當事人、參加人、告訴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如屬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審理單位應准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學校教師、輔導人員、社工人員或其他人員可於程序進行中擔任輔佐人，並得陳述意見。此外，尚可進一步規定：「依《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或其他法律得為輔佐人之人，未能擔任輔佐人時，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得依前項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提出指派申請」。

2. 對於視障者、閱讀障礙者或其他視覺感知有障礙之人

考量審理人、當事人、參加人、告訴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為視覺障礙、

閱讀障礙或其他視覺感知有障礙之人，因無法或難以透過視覺了解審理過程中之重要事證（如：紙本或螢幕上之筆錄、照片、圖像、播放之影像等），而進出時若干視障者亦須由導盲犬陪同進出。為幫助該類障礙者可順利地進出審理場所及更完整的掌握救濟程序之內容，試擬條文明定審理單位應准其攜同他人提供視力協助或口述影像服務、導盲犬入進、替代溝通方式（如：點字、電子檔等）、安裝所需之設備或攜帶程序進行中所需之各項輔具（如：放大鏡、擴視輔具、點字觸摸器、螢幕報讀軟體等）。

3. 對於聽覺障礙者或其他聽覺感知有障礙之人

考量審理人、當事人、參加人、告訴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為聽覺障礙或其他聽覺感知有障礙之人，因無法或難以透過聽覺途徑了解審理過程中之重要事證（如：法官、他造當事人、他造律師、證人之言語上陳述，或語音檔之證物等），而若干聽覺障礙者進出時亦須由導聾犬陪同進出。為幫助該類身心障礙者可順利地進出審理場所及更完整的掌握救濟程序之內容，試擬條文明定，審理單位應准其攜同他人提供手語翻譯或同步聽打服務、導聾犬入進、替代溝通方式（如使用唇語由陪同人協助翻譯）、安裝所需之設備或攜帶程序進行中所需之各項輔具（如助聽器等）。

4. 對於言語障礙或其他言語感知有障礙之人

考量審理人、當事人、參加人、告訴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為言語障礙或其他言語感知有障礙之人，因無法或難以透過言語自行陳述其內容。為幫助該類障礙者可順利地參與救濟程序，試擬條文明定，審理單位應准其攜同他人協助言語陳述或同步聽打服務、現場文字陳述、替代溝通方式（由當事人或參加人書寫後再由陪同人幫忙用口語陳述等）、安裝所需之設備或攜帶程序進行中所需之各項輔具（如言語陳述後可自動轉換成文字之軟體等）。

5. 對於肢障或其他行動功能有障礙之人

考量審理人、當事人、參加人、告訴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為肢障或其他行動功能有障礙之人，因進出審理場所或於審理場所中進行移動，乃至審理過程中如需暫時休息之際，亦須進出審理場所、前往廁所或其他場區，需透過他人協助、使用肢體輔助犬或空間規劃、輔具（如：輪椅、拐杖等），方能順利進行整個救濟程序。為幫助該類障礙者解決上開問題，試擬條文明定，審理單位應准其攜同他人提供行動上之協助、肢體輔助犬入進、替代溝通方式（如：重度腦性麻痺患者，需有熟悉之人協助其進行言語陳述；重度肌萎患者，需要透過特製之螢幕軟體，運用眼球操作滑鼠等）、安裝所需之設備或攜帶

程序進行中所需之各項輔具（如：輪椅、拐杖、推床等）。

6. 對於其他類型之障礙者

除前五類常見之障礙者外，審理人、當事人、參加人、告訴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亦可能為其他類型之障礙者（如：心臟病患者、洗腎患者、顏面傷殘者等）。因前揭障礙者亦可能因自身特殊需求，需進行救濟程序之調整，試擬條文明定，審理單位應按其需求准其攜同他人提供協助或陪伴、替代溝通方式、安裝所需之設備、攜帶程序進行中所需之各項輔具或調整其程序之進行方式。

7. 對於多重障礙者

因審理人、當事人、告訴人、參加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亦可能為多重障礙之人，故可能同時具備上開類型障礙者全部或部分之需求。為解決此類多重障礙者能順利參與救濟程序之進行，試擬條文明定，審理人、當事人、參加人、告訴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同時符合上開類型障礙者之全部或一部障礙特徵者，審理單位應按其需求或其障礙特徵同時依上開各類障礙者全部或部分之方式辦理。

8. 審理單位無障礙空間改善或替代措施之處理方式

依據《近用司法指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2020）原則二之規定：「為確保障礙者得以不受歧視平等近用司法，相關設施與服務必須全面無

障礙」。為落實此項精神，試擬條文明定：「審理人、當事人、參加人、告訴人、協助人或程序關係人為身心障礙者，審理單位應考量現有交通動線、空間狀態、設施狀況及其特殊需求，作必要之改善或給予提供」。又前揭《近用司法指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2020）進一步明文：

當設施和服務無法確保障礙者得以近用現有環境、交通、資訊和通訊時，需要確保程序調整措施。

有鑒於實務運作上，現行法院、行政機關等建築物未必符合無障礙之要求，自當依法賦予審理單位有其程序上之替代措施，以確保身心障礙者於司法程序之進行中能獲得保障，基此，試擬條文明定其缺乏無障礙環境或資訊之程序替代措施，以解決上開問題。

三、對於人身自由受限制障礙者之程序調整建議

依據《近用司法指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2020）原則二之規定：「為確保障礙者得以不受歧視平等近用司法，相關施與服務必須全面無障礙」。為落實此項精神，建議修正《身權法》（1980／2021）第85條，或於特別法中明訂：「身心障礙者因收押、收容、服刑或其他依法限制人身自由之處分（如：吸毒遭勒戒、債務人因被強制執行遭法院裁定管收、強制就醫居留於特定醫院

等），而需另入看守所、收容所、監獄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之場所時，法務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衛生福利部）應考量場所特性、現有設施狀況及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作必要之改善」。

又前揭《近用司法指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2020）進一步明文：

當設施和服務無法確保障礙者得以近用現有環境、交通、資訊和通訊時，需要確保程序調整措施。

有鑑於實務運作上，現行看守所、收容所、勒戒所、監獄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之場所，其空間之設計多有不符無障礙之要求，自當依法賦予法務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其程序上之替代措施，以確保障礙者於依法遭限制人身自由執行中，仍應衡平障礙者之特殊情事，使其能獲得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基此，試擬條文明定，如其設施設備無法或難以改善或其身心狀態不宜進入者，應按其情節以繳納代金、責付、限制住居、令入有無障礙設備設施之場所或以其他替代方案為之，以解決上開問題。

四、違反程序調整與適齡對待措施之法律效果

（一）明訂為當然違背法令可上訴為最終審之事由

審理單位於審理障礙者之案件時，如未依前揭所提程序調整措施進程序調整

及適齡對待措施，除影響障礙者聽審時之程序保障，亦可能影響審理者於審理過程中因自身經驗不足所為之誤判，對於障礙者依法尋求救濟之審級利益將造成實質性之影響。基此，自可參考《刑事訴訟法》（1928／2023）第379條第七款「依本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之規定，試擬條文明定，審理單位於審理身心障礙者之案件時，如未依上開各類障礙者所需程序調整之規定進程序調整及適齡對待措施者，為當然違背法令之事由，可就此向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最終審之上訴尋求救濟。

（二）可由監察院人權委員會做後續調查

考量法院、檢察機關、仲裁機構（庭）、行政機關（構）、其他公法人團體或其他依法令得受理審理程序之團體未依新修正的《身權法》或特別法於審理過程中進程序調整或必要之協助；或法務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依新修正的《身權法》或特別法之規定，未針對依法受限制人身自由之障礙者因缺乏無障礙空間或其特殊情事而做替代性措施之處理，此涉及障礙者救濟權與依法受執行或處分之程序正義與人身安全，基於權力分立之原則，自當由獨立於行政、司法以外之院級政法機關進行監督，方符合CRPD（2014）第33條及《國際人權

法》（*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之《巴黎原則》（*Paris Principles*）。基此，爰建議於《身權法》或特別法中明訂該條款，並明訂如果經調查屬實者，監察院人權委員會有權命其改善，嚴重者，可併同科處罰鍰，倘審理單位仍不改善者，可依法按月要求繳納代金或其他替代措施，直至改善為止。

（三）障礙者法律扶助之保障

依據《近用司法指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2020）明文揭示：

為了保障障礙者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國家應在所有案件提供免費或負擔得起的法律扶助予障礙兒童，並在所有與侵犯、限制或對人權或基本自由產生不利影響（特別是生命權、自由權、人身安全權、財產權、適足居住權、決策自主權和家庭完整）有關的法律程序和訴訟中，為其他所有障礙者提供免費或負擔得起的法律扶助。提供的法律扶助必須是專業、有效和及時的，以使障礙者能夠平等地參與到任何法律程序中。（原則六）

針對障礙者法律扶助之權益，現行《法律扶助法》（2004／2015）分別於第5條及第13條分別有所規範：

本法所稱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三、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無法為完全陳述，於偵查、審判中

未經選任辯護人；或於審判中未經選任代理人，審判長認有選任之必要。（第5條第四項第三款）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申請法律扶助時，無須審查其資力：……二、第五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13條第二項第二款）

此外，為強化障礙者法律扶助之權益，立法院於2014年8月2日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其中如此規定：

身心障礙者受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之權益遭受侵害、無法或難以實施者，得依法提起訴願、訴訟或其他救濟管道主張權利；侵害之權益係屬其他我國已批准或加入之國際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者，亦同。身心障礙者委任律師依前項規定行使權利者，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其扶助業務，得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其他民間團體辦理。（第八條）

就此，執掌障礙者法律扶助業務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乃依上開規定頒布了《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法律扶助專案計畫》，其中該計畫第二點明定：

本計畫扶助對象，以申請時具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且資力為法律扶助基金會所定資力審查標準一點五倍範圍內者為限。身心障礙者領有生活補助證明，可填寫切結書，逕申請本計畫之扶助。（衛生福利部，2017）

現行法雖已有上開障礙者法律扶助制度，惟對於心智障礙者與其他類型之障礙者卻有不同之處理，顯屬不公。為解決上開問題，考量若干障礙者雖屬亟需法律協助之人，但並非均屬經濟上之弱勢者，基於國家資源有限性及資源合理分配之原則，自應視障礙者之資力狀況收取部分或全部所需之酬金為其對價，方能兼顧個案正義與資源合理分配，故可增訂對於經濟能力較不匱乏的障礙者，可收取全部或部分的酬金為條件。

最後，有關法律扶助之申請資格、資力標準、扶助範圍、審核方式、律師酬金數額、障礙者酬金之負擔比例及數額、律師酬金之酌增減條件與數額及委託辦理等事項，屬細節性及技術性之事項，宜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以法規命令予以規範，此部分應於《身權法》或特別法中明定其法源依據。

（四）如何強化司法人員之障礙意識

最後，對於掌管最後救濟管道之司法人員，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處理。

1. 個案提升障礙意識

審理單位於審理障礙者之案件時，應請非本案之同類身心障礙之第三人到場說明該障別之實際生活經驗，必要時得視個案狀況由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特殊教育人員、職業輔導評量人員或其他必要之專業人員到場說明。

2. 整體提升障礙意識

每年應辦理提升障礙意識之教育訓練，其教育訓練之內容、時數、教材之編寫及其他相關事項，應邀集障礙者、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特殊教育人員、職業輔導評量人員或其他必要之專業人員共

同商討。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總會法務處律師）

關鍵詞：司法近用、程序調解、障礙者

參考文獻

《全民健康保險法》（1994／2023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L0060001>

《刑事訴訟法》（1928／2023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10001>

《老人福利法》（1980／2020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D0050037>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201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00064>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D0050194>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1980／2021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D0050046>

《法律扶助法》（2004／2015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A0030157>

《特殊教育法》（1984／2023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H0080027>

《精神衛生法》（1990／2022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L0020030>

衛生福利部（2017）。《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法律扶助專案計畫》（未出版資料）。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2020）。《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https://covenantwatch.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12/%E9%9A%9C%E7%A4%99%E8%80%85%E8%BF%91%E7%94%A8%E5%8F%B8%E6%B3%95%E4%B9%8B%E5%9C%8B%E9%9A%9B%E5%8E%9F%E5%89%87%E8%88%87%E6%8C%87%E5%BC%95_compression_20230719.pdf